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服装厂中的 犹太移民女工境遇探析

杨 静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东欧犹太女性进入美国。犹太女性移民大都因为生活贫困不得不进入就业市场,又因为传统文化和人际关系网络而主要进入美国工业化城市中的服装厂工作。这些犹太服装女工以年轻未婚女性为主,大都作为廉价劳动力分布在制衣生产线的基础性岗位上,面临职业升迁困难,工资处于低水平,以及遭遇性别歧视等困境。对于这样的工作境遇,她们一方面积极适应美国工厂的生产方式,同时也通过跳槽、参加工会和罢工等方式进行抗争,但大多数女性在婚后回归家庭,结束工厂职业生涯,选择以家庭为中心开展新的经济参与活动。

关键词: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犹太女性移民;工厂就业;性别不平等

中图分类号:K7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2)03-0076-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20308

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头十年,共有230余万来自俄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等东、南欧地区的女性移民进入美国,引发了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外来女性移民潮。在这股女性移民大潮中,东欧犹太女性移民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美国参议院移民委员会(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of U. S. Senate,以下简称美国移民委员会)的统计资料显示,1880-1910年间共有80余万犹太女性入境美国,占该时期外来女性移民总数的35%^{[1]34-44}。这些犹太移民女性大都在纽约、波士顿、费城等美国东北部工业城市中落脚,其中的青年未婚女性大量进入服装工厂中充当产业工人,对于推动美国服装行业的发展和女性移民自身及家庭在美国的立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外学界对于该时期犹太女性移民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既有将其作为美国女性移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论述^[2-3],也有专门以犹太女性的移民经历、工厂就业、家庭文化、与美国主流社会的互动等为主题开展研究^[4-6],还有与其他移民群体的比较和综合研究^[7-8]。国内学界尚未出现专门研究该时期犹太女性移民就业问题的成果,只是在一些关于东、南欧移民的整体性研究中稍有涉及。鉴于此,本文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相关档案文献资料,集中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犹太女性移民在服装厂就业中的遭遇及其反应,并深入思考产生此种现象的原因,以期对了解该时期东、南欧女性移民在美国的历史有所裨益。

收稿日期:2021-11-10

作者简介:杨静(1982—),女,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美国妇女史与移民史。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转型时期美国东、南欧女性移民经济参与活动及其影响研究(1880-1920)”(2020PY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美国工业化时期社会价值观重塑研究(1870-1910)”(20XSS007)。

一、犹太移民女性进入服装厂就业的原因

美国移民委员会的调查显示,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的头十年,服装产业一直是美国城市吸纳劳动力最为重要的行业之一,吸收了大约20多万女性劳动力。尤其是在20世纪初,美国女式服装产业中85%至95%的工人是女性,其中尤以来自东、南欧的女性移民为主^{[9]259-269}。从族裔来看,俄裔犹太移民所占比例最高。以纽约市为例,1900年纽约服装产业中俄国犹太女工占40%^{[9]271},到1913年增长到56%^{[10]38}。正如美国移民委员会报告中指出的,“对于东欧犹太人而言,这一行业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最重要的生存资源的地位持续了长达二十年”^{[9]259}。犹太移民进入美国后之所以大量进入服装厂就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 美国服装行业的快速发展

在19世纪末东、南欧女性移民洪流涌入美国之前,美国的服装行业由于受到消费需求的刺激以及新型缝纫机、印染机等新技术发明的运用,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扩张时代。19世纪中期以前,大多数美国人的衣服都是由自己家庭制作,或者去裁缝店定做,或是购买别人的二手衣服。服装作为一项产业,市场较为狭小。但是,随着19世纪中后期美国工业革命和商业革命不断发展,包括服装在内的消费品需求迅速增长。到19世纪后期,城市中男性的外衣、裤子、马甲和衬衫基本已经商业化,而女性服装产品则有衬衣、裙子、内衣、套装、套裙、大衣等诸多品类,基本囊括了女性所有的衣服种类。与服装产业蓬勃发展相伴增长的便是服装就业工人的数量。相关调查显示,1849年美国男士服装工业中雇佣工人的数量大约是9.6万人,这一数据在此后的数十年内都保持稳定增长,到1909年达到了19万人。在女装和童装领域,1859年雇佣工人的数量仅有6000人,到1909年时增长至15万人^{[6]91}。从服装工人的来源来看,在1880年以前,服装业的从业人员主要是来自于爱尔兰、英国、德国、瑞典等西、北欧的“老移民”;到了19世纪末期,迅速被涌入的东、南欧移民女性所取代。

值得注意的是,在内战和重建期间,由共和党控制的联邦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东北部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比如发行国债、豁免或者减免税收等,使得东北部地区在19世纪末期成为美国纺织业的中心,其中尤以马萨诸塞和纽约最为发达。相关数据显示,20世纪初,马萨诸塞州在美国纺织工业中一直居于首位。而纽约市是美国的服装生产中心,190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该市提供了全美国46%的男装、70%的女装、92%的袖领、60%的手套和60%的女帽^{[11]158}。犹太女性移民几乎都是从纽约进入美国的,并且绝大部分选在城市落脚,正好满足了服装行业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

(二) 犹太女性移民面临严峻的经济困境

在东、南欧女性移民中,俄裔犹太女性是较为特殊的一支。历史上看,俄国境内几乎没有犹太人定居,然而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俄国与普鲁士、奥地利对波兰的三次瓜分,让原定居于波兰的犹太人变成了俄国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的异文化属性使其长期遭受沙俄政府的压迫。尤其是19世纪末期俄国频频爆发的反犹太人暴力事件,迫使犹太人从俄国犹太隔离区(Shtetl)离开,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漂洋过海到美国寻求安身立命之所^{[12]114-119}。由于遭受到了沙俄政府的经济高压和深度剥削,俄裔犹太移民普遍贫困,很多犹太家庭在移民美国之前就已经濒临破产^{[13]290-291}。这些移民群体到达美国后几乎是衣食无靠、白手起家。更为严峻的是,相较于欧洲母国,美国社会极高的生活成本给初来乍到的移民家庭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如果单靠家中的男性家长,根本不足以担负起整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因此移民女性不得不大量置身于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获取经济收入。

(三) 德裔犹太移民在服装行业的前期基础

在俄裔犹太移民大量涌入美国之前,先期移民美国的德裔犹太人已在服装行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塑造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俄裔犹太女性的就业路径。在经营服装行业的资本家和工厂主中,德裔犹太商人占据较大比重。早在19世纪中期之前,德裔犹太商人和贩卖二手衣服的小贩

就开始不断寻求在服装领域创业,他们一开始主要投向男装行业,到19世纪70、80年代又扩大到女装行业,成为犹太裔在美国服装行业中的先驱,并很快在服装领域站稳脚跟。该市的布卢门撒尔兄弟公司(Blumenthal Brothers)、哈特·夏弗纳与马克斯公司(Hart, Schaffner & Marx)等多家知名服装公司都是由德裔犹太移民创建和经营的^{[14]235-251}。他们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已经形成了集犹太人为生产商、合同分包商、工人于一体的产业网络链条。

美国服装产业这种非常浓厚的犹太民族移民网络特征,使得犹太服装厂非常喜欢雇佣自己的亲属、同胞以及邻居,而这些人又会带来与他们有相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新工人。久而久之,犹太服装行业因为个人、亲戚、朋友关系已经形成了一张社会关系网,相互之间拉拢更多自己的亲朋好友和来自同一母国地区的人进入工厂。实际上,很多犹太移民女性在还没有到达美国之前,便已经知道将来的去处,即到一家犹太服装厂工作。例如,移民女工戈尔迪·谢尔(Goldie Share)曾回忆道:“在我还没有启程的时候,在美国的亲属已经将我安排到一家非常好的女士衬衫厂工作,在那里我将成为一名机器操作员。”^{[6]94}犹太女性移民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便是通过慈善机构来寻求工作。慈善机构帮助犹太人找工作,服装厂是一个重要的去向。一方面,服装厂急需劳动力,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也不高,能够大量解决用工需求;另一方面,犹太工厂出于人道主义或者想要获得工人等原因,往往对这些慈善机构有资金或物资的捐助,这样一来,慈善机构也投桃报李,向移民女性推荐这些公司^{[15]7}。

(四) 本民族的文化认同

对于那些没有关系网络的犹太移民来说,到达美国后既不会说英语也不认识说英语的其他移民,最大的可能性便是通过说本民族语言意绪第语(Yiddish)或者俄语的人来帮助他们找工作。丽贝卡·格雷特(Rebecca Gealt)是一名从罗马尼亚来的犹太寡妇,她到费城后就直奔那里的犹太工厂,因为她可以与那里的监工交流,最终选择了一家离自己居住地很近的犹太女士套裙厂工作。另一个常用的途径便是通过招工广告来获取工作。例如,犹太社区的意绪第语报纸《犹太前进日报》(Jewish Daily Forward)便是犹太移民找工作的重要媒介。该报定期刊登服装厂的招工广告,比如招聘缝扣子工、机器操作员、熨烫工和缝合工等等,这些广告经常许诺稳定的工作和良好的报酬^{[10]43-44}。此外,宗教信仰也成为推动犹太女性移民进入服装产业的重要因素。犹太人对于像安息日这样的宗教典礼尤为重视,因此,工厂是否在星期六放假或者是否允许在工作场所祈祷,成为很多犹太人在找工作时会着重考虑的问题。犹太移民进入犹太人开设的制衣厂,在宗教信仰和实践方面能够获得相对较大的便利条件和认同感。

总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服装业广泛存在的关系网络和文化认同因素,犹太女性移民进入服装厂工作是非常自然的结果,也是她们在新世界站稳脚跟、维持生活最现实的选择。

二、犹太移民女性在服装厂中的工作境遇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产业革命急速发展的时期,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管理模式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服装行业自不例外。总体的变化趋势是,传统的裁缝独立完成或者裁缝加助手式的制衣过程被流水线式的机器化大生产所取代。在机器化大生产的模式下,工序越来越被细化和分割,生产工人也从裁缝式的全手匠人演变为只需要负责一道工序的“会说话的机器”,以追求最佳经济效益为原则的科学管理模式(或称“泰罗制”)在服装工厂中被广泛采用。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蜂拥而至的犹太女性移民大都被当作廉价劳动力来使用,她们在服装厂的工作境遇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 处于职业阶梯底层,职业晋升难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科学管理模式在服装行业得到运用,使得服装生产环节被一步步细化,工人被反复训练以达到熟练操作某一程序,从而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很多服装厂已经完成了制衣过程的岗位细分。比如,完成一件女士裙子包括如下工作岗位:袖子、身躯部分、袖子和身躯部分组装、裙子、腰部、裙子和腰部的连接、打褶、缝褶、蕾丝生产、修剪、抱扎、画扣眼儿位置、打扣眼儿、缝扣子、衣领、袖

口、衣领安放和机器刺绣。在一些大型工厂中,这些分工还会有更细致的划分,甚至于一个袖子的生产又会分别由4到5个女性工人完成^{[16]157-159}。这种细化分工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工业化时代美国生产领域高效和高速的缩影。

对于较早到美国的犹太女性移民而言,部分熟练掌握制衣技术的女性尚有可能因此在工厂中谋到一个较好的职位,但对于越晚到的移民,传统的纺织技能并不能成为她们挑选岗位的筹码,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普遍的情况是成为一名基层员工,负责衣服一个部件的制作。然而,尽管“女式衬衫工厂的女性移民工人,无论是出于需要工作收入应对经济压力,还是想要获得技能的提升,都表达了她们希望获得岗位提升的强烈愿望”^{[16]172},但对于大多数服装行业的女工而言,几乎没有太大的上升空间。当移民女性成为操作机器的“会说话的工具”之后,工厂管理者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她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成为熟练工以提升劳动效率,而不是变换其他工作岗位。如此一来,她们在服装产业中的岗位晋升就变得异常困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些移民美国前没有先期培训或者没有工作经验的女性在服装工业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职业晋升困境,即便是技术熟练的服装女工在美国的职业晋升也非常有限^{[6]106}。作为外来移民,由于宗教、文化、语言和相貌等方面都相异于美国本土人士,因而被美国主流社会视为“非我族类”的“他者”,一直受到排斥和打压,因此几乎无缘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体面职业。根据美国妇女局的抽样调查显示,只有3.9%的新移民女性从事白领行业^{[17]74-75}。

(二) 性别歧视普遍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服装产业中,性别不平等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比如岗位的分配,职业晋升等等,尤其是工资收入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几乎所有的调查和研究都显示,尽管存在不乏个别女工的工资收入高于男性的现象,但从整体而言,女性的收入水平普遍都低于男性。例如,美国人口普查局选取1899至1914年中的单个年份的年度工资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男士服装生产中女性平均年工资略低于男性的一半,而在女士服装业中,女性年平均工资只有男性的52%左右^[18]。美国劳工局在1907至1908年对5座城市的男士服装产业工人(主要是机器操作工、缝纫工和熨烫工)的工资单的调查显示,女性的收入只有男性的三分之二。例如在芝加哥,女性的平均周工资是男性的70%,大约为7美元;而在纽约女性服装工人的周工资为男性的60%,不到7美元^{[19]130-131}。

一般认为,两性之间的工资不平等主要来自于生产效率的不同,因为男性的速度和耐力是女性所无法达到的,这使得男性工人的工资要超过女性。女性工人自己有时也承认男性在速度和力量上要更胜一筹。一位在芝加哥库本海默服装厂(Kuppenheimer's)工作的女工承认:“她们厂一个男性工人有能力一天生产175件马甲,因为他更强壮,而一个女工最多生产150至160件,但是这是极限,而女工平均的产量是每天100件。因为女性的手部力量真的达不到男性的水平。”^{[6]118}然而,事实上,即便是女性表现出了比男性更高的效率,她们依然不能获得比男性同事更高的工资。在芝加哥的工厂,罗斯·萨斯金(Rose Soskin)是一名机器操作员,负责缝制男式麻料大衣。她抱怨说:“我曾经是厂里缝得最快的工人,但是那些男工在速度上比不上我,每到发工资的时候就会拿着工资信封过来用嘲讽的口吻问我挣了多少。我羞于启齿,因为我没有他们挣得多,尽管我的速度更快。”^{[6]118}更普遍的现象是,女性和男性在相同的岗位从事同种工作,男性也比女性的工资要高。1907至1908年的周工资抽样显示,芝加哥女性缝纫机操作员的工资是8.56美元,男性是9.87美元。在纽约,男士大衣厂的男性熟练技术手工缝纫工人的周工资是10.23美元,而在相同岗位上的熟练女工的工资是7.20美元^{[6]118}。由此可见,服装厂中工资收入的性别不平等,并不完全是基于劳动效率,更多的是制度性因素,根植于该时期美国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文化。

(三) 工作岗位不稳定

对于年轻的犹太女性移民来说,想要找到一份服装厂的工作并不难。但是,她们的工作相当不稳定,岗位变动也比较频繁。1907至1908年,纽约市专门针对工厂女工进行过一次调查,发现该市男式服装工业中28%的女职工在同一岗位的工作时间不超过5个星期。而且这种换工作的高频率在服装工

业的其它部分也非常高^{[20]52}。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移民女性一开始的起薪非常低,根本不足以支付她们的生活开销,因此会不断寻求更高薪水的工作。如果停留在固定的岗位,工厂管理者往往不会主动涨薪,女工需要通过各种方式与资方进行博弈才能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再加上,服装工业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在生产淡季的时候可能存在开工不足,裁员或者降低工资的情况;而在生产旺季时又会面临着别的工厂“高薪”聘请工人的诱惑等等。1925年,一项关于费城移民女性生活的调查提供了很好的证明。调查报告显示,52%受调查的服装工人离开她们的岗位是因为淡季停工,要么她们所在的工厂关闭了,要么暂时没有工作或者就是被直接解雇了。同时,该报告还显示,29%的服装女工是因为不满意低工资或者希望找到更好的职位而离开现有岗位^{[17]115}。1909年,一项针对纽约市移民就业者的调查显示,12%的女工离开先前的岗位要么因为工资太低,要么就是想有更高职位^{[10]196-210}。一位在纽约市制帽厂工作的犹太女工说道:“换工作是我们期待改变经济现状的唯一办法,因为若你呆在一个厂里太长时间……资方老板会迫使你接受更低的工资,因为他们知道你还有金钱以外的其他东西自行补偿。”^{[21]93}此外,诸如工伤事故、结婚、另谋职业等因素也加强了服装厂犹太移民女工的流动性。

(四) 职业生涯短暂

美国人口普查局曾经对1890-1920年间的就业女性的年龄和婚姻特征进行过调查,发现该时期女性就业人员的年龄高度集中在16-24岁之间。1890年,全国女性就业总数为369万人,处于该年龄段的人数高达185万人,占总人数的比重高达50%。1920年,女性就业总人口上涨到820万,该年龄段女性为322万,占总人数的40%^{[22]67}。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女性就业群体的总体特征便是年轻化和未婚,青年未婚女性是该时期美国就业女性的主体。相关统计显示,高达83%入境的东、南欧移民都是处于14至44岁的青壮年^{[23]88}。对于犹太女性移民而言,大部分进入服装行业的女性是从14、15岁开始职业生涯的,一般工作5、6年后,到20岁左右就因成家陆续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毕竟,受传统文化和美国主流社会观念的影响,该时期无论是对于美国本土女性还是对于移民家庭来说,已婚女性在工厂就业都不是受到认可的举动。因此,犹太已婚女性大都回归以家庭为中心的经济生产活动。职业生涯短暂也成为女性工资处于低水平,职业升迁困难和受到性别歧视的重要原因。

三、犹太移民女性对工厂境遇的反应与调适

从整体上看,犹太女工在服装厂扮演的是廉价劳动力的角色,在职业阶梯中处于最底层,是最受压迫和歧视的群体。然而,面对这样的工作境遇,犹太女性相比于其他女性移民群体有着相对不同的反应,并且,不同时期的不同女性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并不相同。

(一) 新环境中的主动调整

正如前文所言,经济贫困是犹太女性移民进入工厂工作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她们必须要尽快赚取工资收入来摆脱生活困境。面对美国服装厂的生产和经营管理模式,这些移民女性首先做的便是适应这样的工作环境。例如,一位从俄国来的犹太女性,她此前在母国从事女装裁缝工作,掌握了非常精细的裁缝技术。到美国以后,为了寻求更高的工作收入,她进入到一家套裙服装厂工作,然雇主提供的工作岗位并不是裁缝,而是机器操作员。在这家服装厂的生产体系下,她在“旧世界”学习的一切技术都将束之高阁。她说道:“他们首先教我怎样成为一名机器操作员。我很快发现,女士服装裁缝是一回事,而机器操作员是另一回事儿。作为裁缝需要依照客人的身形做设计和调整。但是机器操作员就非常不同,监工给一捆衣服材料,通常是6件衣服的量,你得学习操作工作的先后程序。例如,首先生产袖子,然后是领子,你就可以把它们交给负责粗缝的工人了,然后这些部件就到熨烫工手里,然后再回到你的手里。这种工厂的系统,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虽然他们也培训了我,但是整个工作中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整个工作的过程都非常的紧凑。我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因为收入还是不错的。”

的。”^{[6]102} 面对生存问题以及美国工业化时期的生产模式,女性移民想要在工厂中谋得职位,除了适应之外别无他法。

除了适应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外,犹太女工还需要文化方面的适应,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摆脱传统宗教的束缚。在服装厂中,犹太女性进行宗教实践的时间和机会非常有限,尤其是在犹太教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安息日宗教实践。只有出自本民族的工厂相对能够体谅工人的宗教实践需求,一般会在周六关门方便工人过安息日,但这样的举措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少。到了20世纪初,犹太移民社区严格的宗教实践也开始走向衰落,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因为她们在生存压力下没有别的选择。正如一位纽约的服装工人回忆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就两种选择,要么周六正常上班,要么被解雇。但是很多女孩子都不会选择后者,因为那个年代找份工作不容易,服装产业的季节性太强了,生产旺季很快就过去了。”^{[6]142} 尽管到1912年纽约下东区仍然有25%的犹太工人还坚持周六的安息日,但他们大都在同胞的分包合同作坊里工作,而不是正规的服装厂。并且,越来越多的分包制作坊也开始在周六持续工作,至于工厂,几乎所有的工厂在周六都没有停工。

(二) 逆境中的积极进取

进入工厂工作的大部分年轻女性移民虽然都把这段就业经历看作是她们从少女时代到婚姻生活的一个过渡期,但是部分女性移民,尤其是其中的犹太女性在工作上显得非常有进取心。她们对自身经济责任和消费诉求的期许,促使其不断谋求岗位升迁。好的工作就意味着好的收入,这对于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在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之后,很多犹太女性移民到美国的最大希望就是继续改善经济条件,因为这会让她们生活的物质条件得到更好的满足——好的住宿条件,漂亮的衣服,甚至钢琴等其他金钱可以购买的奢侈品^{[24]125-126}。在服装行业中,女性工人在女式成衣、套裙和内衣制造厂中作为设计者、样品生产师以及服装裁剪师助理等几个女性占主导地位的岗位中,有相对较大的岗位升迁机会^{[25]155-168}。虽然男性也在这些部门中从事相应岗位,但是他们并不像在服装产业中的其他岗位那样,成为女性职业上升的障碍,在这些岗位上,女性和男性往往共同分享中高等和偏高岗位。尽管女性在职业升迁中困难重重,但相比于其他行业中的就业女性,服装厂中的女性获得升迁的几率是最高的。在20世纪的前十年,美国服装部门中有85%至95%的劳动力是女性。女性不仅控制着机器操作岗位,除裁剪师以外的其他中高级岗位也不乏女性的身影^{[16]159}。1914年威斯曼(Weiseman)服装公司的16个缝纫机操作员中有11个是女性,其余5个是男性。有2名女性负责服装样品制作,这项工作要求极高,必须拥有最高水平的裁剪技术并对整个服装的制作流程非常熟悉。此外,还有一位女性在熨烫部门担任主管^{[6]111}。尽管最终获得升迁的女性并不多,但毕竟在部分岗位上实现了可能。

(三) 后职业生涯的家庭经济贡献

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她们在工作几年之后往往选择回归家庭,脱离工厂环境,进入家庭生产领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犹太女性移民的职业生涯较为短暂,这些移民女性大都在20岁左右会选择进入婚姻生活,一旦结婚,她们在工厂的职业生涯往往就意味着结束。美国劳工统计局1907至1908年对五大城市的男式服装制造业的调查发现,犹太就业女性中只有7%已婚,并且超过90%的犹太女工处于16至22岁的年龄阶段^{[19]540}。一些学者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南欧女性移民就业问题的研究发现,意大利已婚妇女的就业比例最高,达到了32.6%,其次是马扎族的29.0%,斯拉夫民族的22.9%,爱尔兰人的17.9%,犹太女性是最低的,只有4.4%^{[26]529}。在东、南欧普遍比较保守的文化传统之下,已婚女性依然保持较高就业比例,其根本原因在于自身及家庭的经济贫困。

到了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移民家庭的男性在挣工资的能力获得提升后,已婚女性外出就业的比例就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27]27-29}。而对于犹太女性移民而言,已婚女性之所以不再进入工厂就业,主要原因则在于,他们回归家庭后依然可以采取别的经济参与活动形式来获取收入,比如房间和床位租赁活动。20世纪初期,美国移民委员会的抽样调查显示,犹太移民(主要是俄国犹太移民)从事家庭房间或床铺租赁的比例高达43%,在犹太移民更为集中的大城市,从事这项经营的家庭的比例更高,例如,纽约

市的这项比例便高达 56%^{[28]546}。因此,对于进入婚姻生活的犹太女性而言,她们基本上就退出了工厂就业领域,回归传统的生活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脱离了经济参与活动,而是通过其他手段获取经济收入。

(四) 压迫中的顽强抗争

在工厂工作的年轻女性有很多人加入劳工组织,通过劳工运动维护自身权益。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服装行业由于竞争激烈,资本家大都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人工资(包括随意罚款等)等手段对工人进行压榨。因此,服装行业也成为工人和资本家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行业之一。美国移民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显示,犹太服装女工每天平均工作时间超过 10 小时,有时甚至超过 14 个小时,而且需要一周连续工作六天,有时候全周都没有休息时间^{[29]5}。为了维护服装女工自身的权益,1900 年 7 月以犹太移民女工为主的纽约下东区服装工人成立了名为“国际服装女工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的劳工组织^{[30]383}。1907 至 1908 年,美国遭遇了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激化了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最终爆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服装女工罢工运动。这次罢工运动在短短几个月内发展成为了一场全行业的罢工,共有两万多名服装工人参与。“国际服装女工工会联盟”公开提出了每周工作时间限制在 52 小时、支付加班费、废除不合理的罚款、承认工人合法权利等诉求。在罢工运动中,犹太移民女性最为活跃,她们参与罢工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女工。犹太女性占服装产业劳动力的 55%,但是她们参与罢工运动的比例却高达 66%至 70%^{[31]211}。经过艰苦的斗争与谈判,到 1910 年 2 月中旬时,纽约市 450 家女士衬衣工厂中有 300 家实现了资方与罢工工人之间签订协定,工人的合理诉求得到了部分实现^{[32]239}。此后,美国服装行业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服装女工工会的会员数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最初的几千人增加到 1920 年的 10 多万人^{[30]383}。这些女性工会会员大都是有东、南欧移民背景的女性工人。

不仅如此,犹太移民女性还协助其他民族群体的女性成立工会,参与罢工运动。1912 年,在“国际服装女工联盟”的协助下,波士顿女士衬衣工厂女工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并开展罢工运动。犹太女性领导的女性工会和罢工运动获得了来自波兰、爱尔兰等移民后裔的女性就业者的支持,因为她们对罢工运动所主张的女性和工人阶级权利心生同情和向往^{[25]189-190}。于是,犹太女性成为该时期美国社会运动的重要行动者,“始终公开地参与她们那个时代的所有重大问题”^{[33]ii}。

四、结语

综上所述,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伴随着美国转型时期的外来女性移民大潮,一大批东欧犹太女性进入美国。这些犹太女性移民大都因为生活贫困不得不进入就业市场,其中的年轻未婚女性往往因为传统文化和人际关系网络而进入服装厂工作。她们大都作为廉价劳动力分布在制衣生产线的基础性岗位上,不仅职业升迁困难,工资处于低水平,还遭遇到广泛的性别歧视等。对于这样的工作境遇,她们一方面积极适应美国工厂的生产方式,同时也通过跳槽、参加工会和罢工等方式进行抗争,但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多数犹太移民女性在婚后回归家庭,结束短暂的工厂职业生涯,但在家庭中仍积极开展新的经济活动。

需要说明的是,犹太女性移民在服装厂中的境遇并非特例,不过是该时期广大东、南欧女性移民在美国各类工厂中就业遭遇的缩影。作为外来移民,整个东、南欧女性移民群体遭到主流社会的敌视和排斥,然而她们为了自身和家庭在美国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投身美国工业化大潮之中,通过各种形式的经济参与活动获取收入。除了青年未婚女性在工厂中就业外,广大的其他女性尤其是其中的已婚女性,大都通过以家庭为中心的分包合同制生产、房屋或床位租赁、小商品交易等非正规就业形式广泛地参与经济活动^{[34]62-72}。从长远来看,经过几十年努力和奋斗,女性移民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整体上较之在欧洲母国时期获得了提升,同时对自身、家庭以及美国的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如此,东、南欧移民女性广

泛参与经济活动,加强了与美国主流社会的交往,为她们摆脱旧世界传统文化的束缚,产生追求独立和自由意识创造了条件,最终为她们在美国立足并融入美国社会奠定了基础。

[参 考 文 献]

- [1] U. S. Congress, Senate. 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Vol. 3, Statistical Review of Immigration, 1819–1910 [R].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Office Printing, 1911.
- [2] Donna Gabaccia. From the Other Side: Women, Gender, and Immigrant Life in the U. S. , 1820–1990[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3] Doris Weatherford. Foreign and Female: Immigrant Women in America, 1840 – 1930 [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6.
- [4] Jacob Rader Marcus. The American Jewish Women, 1654–1980[M]. New York: KTAV Publishing House, Inc. , 1981.
- [5] Charlotte Baum, et al. The Jewish Women in America[M]. New York: The Dial press, 1976.
- [6] Susan A. Glenn. Daughters of Shtetl: Life and Labor in the Immigrant Generation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 [7] Kathie Friedman-Kasaba. Memories of Migration: Gender, Ethnicity, and Work in the Lives of Jewish and Italian Women in New York, 1870–1924[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 [8] Corinne Zen Krause. Italian, Jewish, and Slavic Grandmothers in Pittsburgh: Their Economic Roles [J].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Vol. 2, No. 2 (Summer, 1977).
- [9] 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Vol. 11, Clothing Manufacture, Senate Document, No. 633, 61st Cong. , 2nd sess. [R].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 [10] Louise Odencrantz. Italian Women in Industry: A Study of Conditions in New York City [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19.
- [11] 何顺果. 美国史通论[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1.
- [12] 杨静.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裔犹太女性移民美国的原因解析[J]. 北方论丛, 2017(1).
- [13] 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Vol. 12, Immigrants in Industries, Senate Document No. 633, 61st Cong. , 3rd Sess. [R].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 [14] Arcadius Kahan.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Some Pilgrims Progress: Jewish Immigrants from Eastern Europe in the U. S. , 1890–1914 [M].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78(38).
- [15] Wilfred Carsel. A History of the Chicago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M]. Chicago: Normandie House, 1940.
- [16] Cleo Murtland. A Study of the Dress and Waist Industry for the Purpose of Industrial Education[M].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4.
- [17] Caroline Manning. The Immigrant Women and Her Job[M].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0.
- [18]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arning of Factory Workers 1899 to 1927[M].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9.
- [19] Reports on Condition of Woman and Child Wage Earners, vol. 2: Men's Ready-Made Clothing, Senate Document No. 747, 61st Cong. , 3rd Sess. [M].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 [20] New York State Factory Investigating Commission. Fourth Report of the Factory Investigating Commission, 1915[R]. Albany: Lyon company, 1915.
- [21] Mary Van Kleeck. A Seasonal Industry: A Study of the Millinery Trade in New York[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17.
- [22]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Women in Gainful Occupations, 1870–1920[M].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9.
- [23] Reports of Immigration Commission, Vol. 3, Statistical Review of Immigration, 1819–1910 [R].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 [24] Kathy Peiss. Cheap Amusements: Working Women and Leisure in Turn-of - the Century New York [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25] Elizabeth Ewen. Immigrant Women in the Land of Dollars: Life and Culture on the Lower East Side 1890–1925[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5.
- [26] Francesco Cordasco, Eugene Buccioni. The Italians: Social Backgrounds of an American group[M]. Clifton: August M. Kelly Publisher. , 1974.
- [27] Miriam Cohen. Workshop to office two generations of Italian women in New York City, 1900–1950[M].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 [28] 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Vol. 27, “Immigrations in Cities,” Senate Document, No. 338, 61st Cong. , 3rd Sess. [R].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 [29] Joseph Schlossberg. The Rise of the Clothing Workers, Amalgamated Educational Pamphlets[M]. New York: 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 of America, 1921.
- [30] Louise Levine. The Women’s Garment Workers: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M]. New York: B. W. Huebsch, 1925.
- [31] Meredith Tax. The Rising of the Women: Feminist Solidarity and Class Conflict, 1880–1917[M].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0.
- [32] Barbara Weithheimer. We Were There: The Story of Working Women in America [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 [33] Melissa R. Klapper. Ballots, Babies, and Banners of Peace: American Jewish Women’s Activism, 1890–1940[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3.
- [34] 杨静.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东、南欧女性移民经济参与活动探析[J]. 外国问题研究, 2022(1).

An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of Jewish Immigrant Women Labors in the U. S. Garment Factories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Yang Ji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with the rise of immigrant women from eastern and southern Europe, a large number of eastern European Jewish women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Jewish immigrant women had to enter the job market because of their poor life, and because of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terpersonal network, they mainly worked in garment factories in industrial c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Jewish garment women were mainly young and unmarried, who were mostly distributed in basic positions of garment production line as cheap labor force. They were not only suffered difficulty in career promotion, but also from gender inequality widely. For such working conditions, on the one hand, they actively adopt to the production mode of American factories, but also through job-hopping, labor unions and strikes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however, most of Jewish garment women returned to their families through marriage, and thus finished their factory careers and participated new economic activities centered on their families.

Keywords: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Jewish immigrant women; factory employment; gender inequality

[责任编辑:孟西]